

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仁川 方磊 王友 王琥生 冯修文
刘明朗 李振东 **何永祺** 肖笃宁 冷耀光
花有泰 杨邦杰 杨青培 金和春 张琦
赵新良 唐岐 高纯生 高学忱 徐兴田
黄宝英 董厚德

主编 张鹤龄

副主编 郝永志 (常务) 方烈

冯贵盛 王振江 郁红军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洪范 马成尧 尹文耀 王学东 韦洪宽
田肥 史鄂侯 刘闯 刘福贵 齐建珍
祁勇 孙晋山 曲振富 李文礼 李戈军
李永春 李向平 李连仲 李国运 李英鹏
陆大道 沈亨理 邵荣弟 邱恒济 陈殿秀
张成绪 周英德 范世铎 范钦华 钟以章
贺伟 胡延涛 龚国赞 曹铁男 常炳南
穆振权

编写人员

国土开发整治的外部环境分析专题

李连仲 秦洪祥 陈萍

生产力总体布局与区域开发整治专题

冯贵盛 李连仲 郝永志 耿新才

水资源开发利用专题

田肥 曲振富 杨诣 董维藩 陈丽润
洪跃勋 于洪 王驰

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专题

陈传康 刘闯 金德生 冯圣德 刘铁铮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专题

陈诗禔 李永春 关渤南 于大斌 金钟大
方 烈 彭清珠

海洋资源综合开发专题

史鄂侯 黄水光 马海涛 任汪洋 刘国海
刘锦明 仲桂清 朱燮昌 李传芝 李宗品
沈亮夫 时建人 张裕华 周朝峙 赵一兵
赵伊川 祝振山 胡海鹰

产业结构调整专题

胡延涛 王希文 陶宪润 沈 强 杨青培

农业发展与布局专题

王学东 金正直 刘铁铮 张耀光 罗沈平
刘福仁 程玉锋 刘 伟 于彦亮 李阜丰
王焕令 景宗湄 胡宜鸣 马佩永 陈代林
田 肥 李大文 李思斋 林春欣 王国栋
任凤阁 罗时柔

工业发展与布局专题

陆大道 刘 毅 赵令勋 陈汉欣 周世宽
凡 杰 曲 涛 雷必舫 张 雷 袁 朱
庞效民 袁喜路 张玉斌 邱恒济 齐建珍
李纯武

能源建设与布局专题

张成绪 龚国赞 刘 铭 郁红军 苏德祥
马少华 杨青培

综合交通运输网专题

丁振京 祁 勇 张文尝 赵永顺 金凤君
王 驰 徐永生

人口发展与城镇布局专题

孙晋山 董黎明 王淑华 刘长新 孙德兰
林 巧 钱汉书 叶向东 田秀芝 孟令凯

杨爱敏 陈振杰 贾晓琳 张广忠 唐万杰
刘志虹 宋庆辉 姚旭 杜晓茹 刘红星
杨齐 李向明 杨培珍 宋海燕 杨莉萍
张爱珠 王维国 姜虹 刘伟奇

城市环境保护与整治专题

马成尧 刘玉机 孔维芳 胡建阳 王明杰
仇伟光 刘立 刘玉璞 张启德 俞大乾
袁留根 鞠复华

生态环境保护与整治专题

董厚德 沈亨理 徐仁杰 王佑林 赵锐
罗常国 康晓光 王绍斌 朱德海 张伟东
曹志强 胡建阳 刘铁铮 梁知洁 赵艺欣
方天昆 吴敬学 鄂玉江 孔繁之 刘宗钦
刘元敏 孙玉珍 陈国华 杜石 王占乙
朱何

地质灾害防治与区域稳定性评价专题

钟以章 铁大昕 陈爱萍 蒋秀琴 张文阁
张正曙 郑双成 王国新 高常波 万波
吴明大 肖秀清 李洪秀

编者说明

《辽宁国土规划·专题卷》，包括十五个专项规划，规划内容在原专题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加以浓缩。各专题文稿都是由有关课题组整理提供的，汇总编辑时，本着尊重专项规划研究成果的原则，只对规划中个别词句做了必要的修改，基本内容未做大的变动。

专题规划的内容、观点有的与综合规划不尽一致。这是因为，综合规划是在专项规划和行业规划基础上，又经过若干综合研究编制的。虽然综合规划采用了专项规划的大部分内容和观点，但也舍略了个别专项规划的内容、观点和方案。在编辑汇总专项规划时，我们保留专项规划与综合规划不一致的地方，主要考虑综合规划未予采纳的某些观点、方案，不一定说明专项规划中提的不合适，把不同的观点、方案同时给出，便于应用部门和读者进行多方案比较、研究。有些专项规划的结论性意见，综合规划没采用，但其思路、方法，有参考价值。有的观点、方案，从现实条件看是不可行的，但若千年后可能是可行的，立此存照，可能有益于未来。

由于专项规划完成的时间先后不一，现状年不统一，各专项规划又都是独立进行的，尽管规划过程中几次协调，还可能存在同一内容，数据不一致的地方。遇此情况，应用时建议以综合规划为准，或多方核对。

借《辽宁国土规划·专题卷》出版之际，再次向参加专项规划工作的部门、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向热心支持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单位和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表示深切的敬意！

汇总编辑时间匆忙，水平所限，疏漏和错误之处敬请指正。

编者

1992年5月

目 录

辽宁省国土开发整治的外部环境分析·····	1
辽宁省生产力总体布局与区域开发整治研究·····	40
辽宁省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研究·····	90
辽宁省土地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研究·····	192
辽宁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研究·····	244
辽宁省海洋资源综合开发规划研究·····	293
辽宁省产业结构调整规划研究·····	357
辽宁省农业发展与布局规划研究·····	415
辽宁省工业发展与布局规划研究·····	466
辽宁省能源建设与布局规划研究·····	542
辽宁省综合交通运输网规划研究·····	586
辽宁省人口发展与城镇布局规划研究·····	639
辽宁省城市环境保护与整治规划研究·····	721
辽宁省生态环境保护与整治规划研究·····	772
辽宁省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研究与区域稳定性评价·····	840

辽宁省国土开发整治的外部环境分析

一、辽宁区位条件

辽宁位于亚洲大陆东岸、西太平洋中纬度的东北亚地区。背负亚洲大陆联结欧洲，面向太平洋，是我国东北经济区的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吉林通向世界的海路进出门户。其南端的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构成首都北京和渤海海防前哨的虎钳区位战略要地。

辽宁区位在国际上东出可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朝鲜、日本；北上可去独联体远东和西伯利亚；西进经由正在建设中的集（宁）—通（辽）—沈阳线，是我国北线亚欧大陆桥东端的桥头堡；南下可联结东北亚与东南亚的海陆便径。辽宁区位利于我省发展海陆运输与世界各大洲的国家和地区开展经济、文化、科技、信息交流。冬季还可提供独联体远东、西伯利亚远出南亚和南太平洋的陆域过境出海口岸。

辽宁东邻朝鲜半岛隔日本海与日本相望，可谓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

从长远国际间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旅游等广角来看，在朝鲜南北局势松动和日朝外交上的解冻态势下，以及日本拟建朝鲜海峡海底隧道，从沈阳经由丹东—新义州—汉城—釜山等地穿越朝日海底隧道直抵日本，是我国和亚欧大陆各国通往日本的陆路最近便径。

若将大连、营口新港开辟为亚欧大陆桥港，构成我国北线亚欧大陆桥经由沈阳—满洲里接西伯利亚大铁路西抵欧洲各国或者也可经由沈阳—通（辽）集（宁）接集二线越蒙古和独联体与欧洲铁路联网，此线较经由满洲里更

近,并可为蒙古提供内陆出海就近门户。上述两路径抵莫斯科后可与欧洲大陆全境51万公里铁路并网,如莫斯科—华沙—柏林—埃森—鹿特丹;莫斯科—列宁格勒—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奥斯陆;莫斯科—华沙—柏林—科隆—布鲁塞尔—巴黎,此线1993年6月以后,从布鲁塞尔经由法国加来的桑加特穿越英吉利海峡的海底隧道,进入英格兰东南部海港城市多佛尔的莎士比亚山崖直抵伦敦。

我国北线亚欧大陆桥一旦开通,将改变目前从香港转口经由纳霍德卡;再经由西伯利亚大铁路转运西欧。如以大连辟为陆桥港比绕道纳霍德卡近1260公里;以营口新港为陆桥港又近220公里;并可免去冬季纳霍德卡结冰停航的不便。此二港如辟为陆桥港为辽宁建立群体式港口,发挥内外海陆运输新格局,更好地参与国际间经济合作、竞争创造了条件。还要看到我国北线亚欧大陆桥的开通,对辽宁为大陆桥全线服务,发展各项产业提供良好机遇,从而将使辽宁面对东西双向对外开放通道。

从发展观点看,东北亚经济圈的经济发 展,可能出现联结东北亚与东南亚的陆域南北纵贯铁路线,如中印半岛—广州—北京—沈阳—平壤—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国际大动脉,届时辽宁在东北亚和亚洲东部的经济地位和作用,将更加显现出区位的重要。

若从航空区位分析,以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为圆心,以650公里为半径,有符拉迪沃斯托克、平壤、汉城、仁川;以1260公里为半径,有哈巴罗夫斯克、大阪、北九州、长崎、釜山、全州丽水、布拉戈维申斯克;以1470公里为半径有札幌、东京、名古屋、共青城、赤塔、乌兰乌德、乌兰巴托等亚洲东部的知名城市和经济中心。因此说,辽宁的区位是亚洲东部沿海与亚洲内陆,以及亚洲的东北亚与东南亚各国和地区之间发展经济贸易,文化科技和友好往来的国际通道中继站。

世界经济重心正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近年来太平洋沿岸地区经济贸易,占世界贸易额近1/4,到本世纪末可能接近1/3。辽宁位于太平洋经济圈的远东地区,而远东地区又是世界经济与该区域各国和地区经济实在利益与发展的聚焦点;正在形成东北亚经济圈,未来这一地区将要大跨度开放。而远东地区的东北亚范围内的日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朝鲜、独联体

的远东以及西伯利亚和我国东北,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新的国际分工与多边协作,这一地区的各国和地区具有经济资源的互补性,它表现在东邻日本是当今世界经济大国,但在自然资源上是短缺国家,寄希望于我国东北和辽宁、独联体的远东、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开发;南朝鲜虽也是较发达国家,在自然资源上也感到不足,希望在辽宁、东北寻求合作,而辽宁除有重工业基地优势可与独联体相互合作外,辽宁还有轻工业与劳力资源的优势,正是独联体的远东、西伯利亚希求互补之处。辽宁的区位又处于东邻日本、南朝鲜发达区与独联体的远东、西伯利亚相对滞后经济区二者之间的结合部;辽宁有南大门的海路并有联结东、西、北的陆域大门,构成了贯通南北、承接东西的全方位开放和吸纳的区位格局。辽宁具有建成东北经济区外向型经济前缘地带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区位条件。

从经济区域态势上看,90年代东北亚经济有可能出现双边多项合作、多边单项合作,尤其是联合开发自然资源进行劳务合作,如中国与独联体的劳务合作、日本与独联体的能源和其他资源开发合作以及东北亚各国贸易往来、投资合作与技术交流是大有前景的趋势。日本、南朝鲜,尤其日本会对东北亚各国和地区大幅度地资本输出。近年来日本以直接投资,购买证券,提供贷款等形式加速资本输出,1984年为567亿美元,1989年达到190亿美元,目前每年正以1000亿美元的证券形式对外进行资本输出。

世界经济正朝着集团化、区域化方向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国内外拟议或正在形成中的国际经济组织应运而生,有“东亚经济圈”、“远东跨国经济特区”、“环日本海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区”、“图门江跨边界特区”以及国内正在形成中的“环渤海经济圈”的构想。

辽宁所处的区位决定了不管哪一个经济组织,都应有辽宁参加,这就为辽宁经济提供与世界经济发生联系的区位环境。

日本新闻媒介把1990年定为步入东北亚经济时代的“助跑年”,今年日本已将新潟县定为对原苏联开展经济工作的重点县,富山县定为对中国东北开展经济工作重点县,并计划在日本海沿岸加紧进行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以建成里日本为日本海沿岸工业地带与表日本太平洋沿岸工业带相对应,并在札幌附近的石狩町扩建海港,从目前四个泊位发展到19个泊位;富山机场

北海道千岁机场也在扩建和新建中。日本之热衷于东北亚经济圈是出于下述考虑:

1. 1993年欧洲共同体统一大市场将建立,美加已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日本担心在国际上被孤立,故加速东北亚经济圈的建立,以资与欧美抗衡。

2. 日本企业界不断向劳力资源便宜地区转移,前一阶段投资于“四小龙”,近年“四小龙”劳力价格提高,于是转向东盟国家;与此同时又在无视东北亚的我国东北的劳力资源,同时又渴求开发独联体远东、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

3. 日本为实现其“经济大国”并走向“政治大国”的夙愿,今后要借助经济实力为后盾,选定东北亚经济为其经济实力基础目标之一。

南朝鲜在确定西海岸开发计划中,针对21世纪的西太平洋经济时代,实施所谓“北方政策”,重点发展同我国东北与独联体远东经济关系,最近南朝鲜提出建立“环渤海经济圈”,它的构想是将投资重点集中在辽宁、山东、北京、天津,其构想根据是环渤海地区在地理上与南朝鲜接近,劳动力较深圳、厦门等南方特区便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在加紧开放准备,拟建“平壤经济特区”;今年10月18日于平壤中、蒙、朝、南朝鲜签订了共同建设“图们江工程”,要把跨三国地带建成东方鹿特丹,估计未来20年将在此地带投资300亿美元,我国已将辽东半岛开辟为沿海对外开放区。综观辽宁区位周围环境,都说明东北亚经济圈势将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区域之一的态势是无疑的。

东北亚经济圈是西太平洋沿岸的一个国际性经济区域组织,辽宁为东北亚经济圈的一员,把辽宁建成东北亚经济圈中的工业地带,这是区位的机遇。同时要下大气力加强与独联体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合作,向其提供开发所需的各种后备基地,如劳务、粮食、日用消费品等等。

独联体远东面积621.6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面积1/7,人口780万,占全独联体人口2.6%;如果把西伯利亚加在一起,面积为1276万平方公里,与独联体国土面积的1/2以上,人口只有3000万,其能源储量占世界的1/3,仅其中煤储量占世界1/2,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占1/4和1/3。俄罗斯人原为欧洲

人, 16世纪开始越过乌拉尔山脉东进, 出于地理气候等原因, 至今只有3 000万人。而英国某科研机构预测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至少需8 000万人, 尚缺5 000万人。辽宁对独联体优势是劳动力资源多, 劳务成本低, 素质较好, 如与古巴、越南人比较, 更适于西伯利亚与远东气候条件, 可向独联体提供中低层次劳务, 如矿业开发、森林采伐、海洋捕捞、公用设施建筑和蔬菜的栽培以及较高层次的医疗等方面提供服务。总之, 我们要研究独联体方面劳务需求, 有针对性地进行劳务输出前的培训和文明素养的教育, 打开向独联体方面劳务输出的市场; 另外辽宁在东北三省基础好, 可向独联体方面提供轻工纺织品、轻工业电子产品、日用消费品, 还可向独联体方面提供新鲜蔬菜、水果, 尤其在春末夏初季节, 独联体方面蔬菜极其短缺, 这是因为独联体方面远东、西伯利亚气候偏冷所致, 我们可以补其不足。辽宁对独联体方面地理位置较近, 海陆皆方便, 远比独联体方面从欧洲东运费用低廉保鲜。扩大商品贸易, 即使独联体方面现时外汇短缺, 也可以以易货方式或补偿贸易方式进行。

要充分利用辽宁在东北亚处于东部发展, 西、北经济滞后的结合部区位, 去开拓东北亚三亿人口的大市场; 向西开拓亚欧大陆桥沿线的市场是辽宁走向世界的区位目标所在。

二、辽宁省国土开发整治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分析

(一) 世界经济的新趋势新变化

世界经济在大动荡、大改组、大变革中步入了90年代。在本世纪这最后10年和两个世纪交替的历史关头, 认识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无疑是十分重要的。90年代必将是全球性的改革和调整更加深化, 全球性经济更加趋于国际化和一体化的时期, 也是希望与风险同步、机遇与挑战共存的10年, 我们认为, 90年代总的世界经济形势将好于80年代。当前, 世界经济的新趋势新变化可概括如下:

1.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从战后的两极向多极化发展, 两个超级大国控制

世界事务的能力显著减退,由于裁减军备谈判的进展和东西方关系的改善,预计世界形势将进一步缓和,大国的争夺、各国的竞争将集中到科技与经济领域,夺取在综合国力方面的优势。所谓综合国力,包括经济、政治、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其中科技经济实力是衡量综合国力的主要标志。

在90年代或21世纪,世界各主要国家,将围绕综合国力展开激烈的竞争和较量。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和和平演变将会加强,演变与反演变的斗争将是长期的。

2. 各国相互依存加深,全球经济国际化与跨国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离开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和协调,一国的经济将难以生存和发展。

科技的突飞猛进带动了生产力的飞跃,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打破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实行要素的优化组合,选择生产成本最低的地区进行生产。在生产的国际化得到发展的同时,国际贸易和国际资金流动规模不断扩大。

在推动世界经济走向跨国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起着重要作用。到80年代初,跨国公司已控制资本主义世界出口额的80%和跨国直接投资的90%以上。它们还控制了世界新技术和新工艺专利的80%以上。

跨国公司为了扩大经营和向全球各地区的渗透,为了克服各种贸易壁垒和非贸易壁垒的限制,普遍扩大了海外直接投资,掀起了跨国界的企业兼并浪潮,各种形式的合资合作企业迅速增加。外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从1984年的1650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3290亿美元,1988年,美国公司兼并西欧企业从1987年的17亿美元增加到36亿美元,各国、各地区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依赖加深。

3. 世界经济中的区域集团化趋势不断加强,北美集团、欧共体和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三大区域经济,其中,以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最快,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富有活力的地区,世界经济重心继续东移。由原苏东国家组成的经互会集团,内部矛盾丛生,经济发生危机,濒于解体,原苏东地区将是90年代变化最大的地区。

美国和加拿大缔结了以10年为期限的自由贸易协定,形成了美加自由贸易区。美国和墨西哥之间也在磋商。欧共体已从九国扩大到十二国,预计1992年实现欧共体统一大市场,以欧共体为核心的欧洲经济一体化将得到

发展。亚太地区的区域合作组织还在酝酿中，现已有环太平洋区域的性组织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PECC）和官方的亚太地区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APEC），然而亚太地区在区域集团化方面明显落后于北美和西欧，现在提出了“东亚经济圈”（由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等组成）、“中国经济圈”（大陆、台湾、港澳和海外华人经济组成），“黄海经济圈”、“渤海黄海经济区”、“环日本海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等各种设想，尚属酝酿阶段。本区内东盟内部一体化程度较高。日本正在加紧推动以它为主导，包括亚洲“四小龙”、东盟组成的东亚经济圈，以同北美、西欧抗衡。

4. 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进展，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发展，国际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软化。

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将集中于发展知识与技术密集部门，而将淘汰下来的劳动密集型与资金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将成为最大的经济部门，信息产业已开始脱离第三产业，成为第四产业。80年代，发达国家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开始把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带有劳动密集特点的零配件生产和装配线，转移到投资环境优越的发展中国家。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也加快了产业升级的步伐。在向海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时，抢先一步发展高技术产业，抢占国际市场。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产业也进一步软化。10年前出口计算机中硬件软件之比为8:2，而现在为2:8。在许多高技术产业中，从事科研、设计、管理和生产服务性的人员已占多数，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已占少数，个别部门后者比例不到1:3。大多数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2/3，而美国和加拿大这一比重已达70%。90年代，美国将有90%的劳动力在服务业工作。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到10%以下。服务业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比重也将不断扩大。

信息产业（包括科研、教育、培训、咨询、通信、管理、计算机软件等，属于信息采集、加工和传输部门）的产值，已占发达国家的1/2，在美国已达60%。

5. 世界经济在动荡与失衡中发展，各种力量竞争、摩擦的加剧，使各

国的经济政策调节和“国际协调”作用更加突出。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经济实力明显衰退,日本与西德迅速崛起,西方美、日、西欧三足鼎立之势已经形成。它们相互之间的贸易摩擦以及同亚洲“四小龙”的贸易摩擦有加剧之势。在发展中国家,两极分化严重,穷其愈穷,富者愈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世界经济的动荡,表现在股市暴跌,美元汇价的剧烈波动,能源和其它初级产品价格的摆动等,在世界经济处于转型时期,价格波动是世界经济动荡的主要因素,并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趋于恶化。

世界经济得以在动荡和失衡中发展,其主要原因,一是各国及时的调节经济政策,增强应变能力;二是国际协调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国家的协调,曾使它们度过了70年代的能源危机,减少了1987年西方股市暴跌和汇率波动的不利影响。

今后,随着竞争与摩擦的加剧,国际协调势将更加频繁和加强。

6. 随着科技和教育在经济、社会生活中作用明显的提高,各国更加重视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将日趋激烈。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科技成果转化商品的周期日趋缩短。据调查,科技成果转化生产力的周期,18世纪需100年,19世纪为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缩短为7年,目前在发达国家产品更新,已缩短到5年、3年甚至更短。科技和人材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80年代伊始,发达国家普遍制定了以科技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政策,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推出了“科技立国”的规划,大幅度增加了研究开发投资和教育投资,前者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普遍达到2.5—3.0%,并推行了不少开发尖端技术的工程。

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必将成为未来决定各国地位的主要因素,发达国家围绕着高技术开发的竞争不断升级,90年代,某些新技术的开发将取得重大突破。

7. 国际交易中,商品贸易的比重不断缩小,外汇交易额迅猛增加,劳务交易额不断上升,国际贸易结构不断升级。

与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相对下降,构成鲜明对比的是货币交易的转旺。

在伦敦的欧洲货币市场上,每年的外汇成交额,达75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贸易额的25倍。据国际清算银行1989年4月的调查,全球每天的外汇交易额为6400亿美元。

目前世界商品贸易和劳务贸易的比例,大约为2:1,但由于后者增长迅速,到本世纪末,两者将基本持平。发达国家垄断了全部劳务贸易额的85%,和金融、保险、通讯、技术转让、计算机软件等大部分高层次劳务贸易,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务贸易额所占比重不到15%,而且都是低层次的劳务。

90年代的世界贸易将继续增长,贸易不平衡状态将有所改善,美国的逆差和日本、德国、亚洲“四小龙”的贸易顺差将有所减少,但不平衡状况不可能有根本改变。

技术密集型产品、制成品贸易额,将有迅速发展,其比重将不断上升,而初级产品贸易的比重将继续下降。

8. 由于全球性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新技术革命的进展,工业对初级产品和原材料的需求,将呈递减趋势,食品与粮食以外的初级产品价格,将在波动中相对疲软。

由于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发展经济所需的原材料和能源大大减少,1980—1983年间,美国生产一辆汽车用的钢材减少了26%。新兴工业在这方面有飞跃性进展,如生产一枚半导体芯片所使用的原材料,只占成本的1—3%。近10年,美国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下降了30%,材料和金属消耗量分别下降了20%和16%,目前单位工业产品所需原材料和能源,只有本世纪初的2/5。

鉴于上述情况,90年代初级产品价格,将继续疲软,但食品和粮食价格有可能上升,90年代后半期,石油价格有可能再度回升。

9. 适应动荡多变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的形势,不同类型国家都注重宏观调节的改进,经济政策的调整,企业管理发生新变化。

由于西方国家注重改进宏观调控,实行大力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加上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下降,80年代中期,西方经济已摆脱“滞胀”困境。连续增长7年,年均增长率为3%,通货膨胀率从70年代末的两位数下降至5%以下,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形态发生变化。

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改革和调整中改进宏观调节,稳定物价,治理通货膨胀,有些国家已经取得成效,原苏联、东欧国家形势严峻。

不同类型的国家,都注意互相借鉴宏观调控和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以提高抗波动和应变能力,以稳定经济,力求适度增长。

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改进了生产调节和存货控制,使整个生产过程中的盲目性得到控制,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

10. 发展中国家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债务危机尚未缓解,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已成为迫切的课题。

1989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从上半年的5.3%,下降至3.4%左右,债务总额达1.32万亿美元,外债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87年的20%,上升为1989年的50% (国际上公认的危机临界点为20%)。债务危机既危及国际信贷—金融体系,更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对发达国家也不利,虽然经过多轮磋商,推出不少计划和方案,但尚未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

整个发展中国家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发展很不平衡,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加快,走在发展中国家前列,亚洲“四小龙”有可能跨入发达国家(地区)行列。拉美地区目前经济危机深重,1989年经济增长率下滑到0.2%,通货膨胀率达到1988年的472.8%,债务总额达4 048.66亿美元。非洲经济198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6%左右,外贸逆差增加,债务负担沉重。9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仍看不到明显的改善迹象。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团结斗争,加强南南合作,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

(二) 国际经济中的机遇与制约因素分析

1. 国际经济中的机遇与有利因素。90年代,我国和我省面临着又一次大好机遇,出现了不少有利于我经济发展的因素:如国际上兴起的产业结构调整浪潮、海外投资浪潮,正在向海外寻找投资市场;亚太地区崛起为全球经济中最富有活力的地区。国际贸易、金融和投资活动,正在向亚太地区聚拢,对于作为太平洋大国的我国和位于太平洋沿岸的辽东半岛,提供了优

越的空间和多种机遇；目前，国际市场上游资还是充裕的，正在选择投资对象，1989年底，各国保有外汇总额高达7 680亿美元，世界上各类国家都采取积极的步骤，吸引外资，为本国的经济建设所用；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新技术新成果和新的管理经验层出不穷，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新兴产业相继诞生，如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以吸收，充分享受后发性利益，可使我们少走弯路，缩短工业化进程；再加上世界局势的缓和，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集中人力、财力、物力进行经济建设。下面我们将逐一加以分析。

首先，国际性的结构调整、产业转移和海外投资浪潮为我引进产业、技术、兴办三资企业提供了良好机遇。按照产业演进规律，此次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升级与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第三产业（服务业）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以上，经济结构趋向软化，发达国家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它们在发展耗能少、耗原材料少、污染少、附加价值高的技术密集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必然要把那些靠大量的原材料、能源、资金、劳力的投入，而且公害严重的“烟囱工业”、“机器工业”（即资金密集型工业与劳动密集型工业）加以淘汰，并向海外转移，同时，新兴产业中一些带有劳动密集特点的元器件、零部件生产和装配线，也向投资环境好的海外地区转移。

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由于国内劳力价格上升等生产成本的提高，大力实行产业升级，不断地把丧失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这一进程基本上是循着动态比较利益规律进展的。当然，产业转移与海外投资浪潮，还同全球经济的国际化、跨国化、国际贸易格局的改组、市场的瓜分有关。

国际产业发展的历史证明，这种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向海外转移是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战后曾出现过三次重要的机遇，第一次是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实行从轻型向重型结构的升级，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亚洲“四小龙”抓住这一机遇，大力吸引本国所需要的产业和技术，大力引进外资，实现了经济的起飞。第二次是70年代初，在两次石油危机时期，西方发达国家注重发展节能节资源型的高技术产业，把重工业与化工工

业向海外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又抓住这一机遇,大力吸收重化工产业和外资,实行从轻型向重型结构的升级,使产业结构再上新台阶。第三次是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以尖端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方面开展激烈竞争,1985年日元在大幅度升值的冲击下,日本实行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的重大转移与升级,以微电子工业、半导体为中心的高技术产业群和服务业成为日本经济的支柱产业。由于日元升值,国内生产成本提高,再加上欧美对日本的压力,日本把淘汰下来的重化工产业,向海外转移的同时,为了突破贸易保护主义,扩大了对海外投资,在世界各地建立海外生产基地,实行“迂回”式出口和渗透,以保住海外市场。

由于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实力增强,它们也加入到第三产业转移与海外投资浪潮中来。在欧美国家的压力下,南朝鲜、台湾本币升值,亚洲“四小龙”享有的“普惠制”被取消,加上工资大幅度提高,生产成本上升,它们也向海外转移食品、玩具、鞋类、旅游用品、塑料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并积极向海外投资,建立了家电和劳动密集型的独资与合资企业,资源与能源开发型的产业等。

第三次产业转移和海外投资浪潮,是一次多层次多领域的转移与投资浪潮。除了劳动密集型与资金密集型产业而外,技术密集与知识密集型产业中,得带有劳动密集特点的零配件装配生产线,也向海外寻求投资环境优越的市场和海外基地。

国际市场游资充裕,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游资,急需寻找投资市场。据国际金融机构1988年4月的调查,伦敦外汇交易市场日交易额从3年前的900亿美元,增加到1870亿美元,纽约外汇市场日交易额,从585亿美元,增加到1290亿美元,东京外汇市场日交易额,从480亿美元上升到1150亿美元。虽然海湾战争后,国际上对资金的需求有大幅度的增加,但90年代可供利用的国际资金,还是很可观的,问题在于要有明确的外资战略,得力而配套的政策和吸引措施,要有精通国际金融与国际经营的人才和良好的投资环境。

跨国界的企业兼并,合资合作企业增加迅速。1988年美国公司兼并西欧企业总额从1987年的17亿美元增加到36亿美元,截止1989年1月,日本在西